

未经审定
请勿引用

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

(初 稿)

(1966.5—1976.10)

编辑说明

一、遵照省委的指示，我们编写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初稿）（以下简称《大事记》）。《大事记》分四个历史阶段（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记述社会主义时期浙江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勾画浙江党史的大致轮廓。为了解浙江解放以来党史的发展过程，从现状和历史的结合上研究浙江省情，提供一个可资查考的史实。“以史为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的基本路线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写《大事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十二大”、“十三大”文献为准绳。简要叙述本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大事。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历史。

三、《大事记》记述范围是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主线，统纂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将社会主义时期各个阶段我省发生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以条目形式编纂，力求大事不漏，要事突出。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些事件和问题按其性质所需，结合采用记事本末体加以适当集中的叙述。各个条目记述的历史事件的背景，先后继起或同时发生的各个事件的内在联系，力求表述清楚，以明历史发展的轨迹。

五、《大事记》的时限为：上限从杭州解放之日起，下限暂记到1987年12月止。

六、参加编写《大事记》的同志，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和报刊资料，经初步查实考证，于1987年8月编出《大事记》（草稿），共31万字，2713个条目。9月，有关领导和全体编写人员对《大事记》（草稿），从指导思想、编写体例和要求、内容、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讨论，逐年逐条提出修改意见。经过较大的增删和修改写出《大事记》（初稿）。由于编者理论政策水平和掌握材料所限，缺点、错误、遗漏和不妥、不周、不够准确之处，敬请各位老同志、各地、各单位领导和广大编史工作者多多提出意见，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编 者

1988年3月

目 录

一九六六年	1
一九六七年	14
一九六八年	32
一九六九年	49
一九七〇年	63
一九七一年	76
一九七二年	87
一九七三年	98
一九七四年	111
一九七五年	129
一九七六年	141

王松高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九六六年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根据《通知》的精神，18日至20日，省委组织的“文化大革命”写作班子，署名“辛文兵”在《浙江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18·21日，《浙江日报》又连载了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揭露吴含的反革命真面目——吴含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5月26日至31日，《浙江日报》在“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学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了全省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浙江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威力最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指路明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们是多大的‘权威’，我们工农兵都要批判它，打倒它，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公布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部分青年学生首先响应,起来造反。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高等院校部分师生贴出了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杭州大学一批师生到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贴大字报,指责省委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方向。3日,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的大字报。由此,一些大专院校和地区的党政负责人,开始被一些人作为冲击对象,全省部分地区和单位开始出现混乱。

6月5日,为了有秩序有领导地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抽调省级机关干部和省军区系统干部(省军区第一批抽调200名干部,其中团级以上60名),向在杭八所大专院校和新闻、文化等部门派出了工作组或联络组,各地(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些中学和文艺团体,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组成了以省委常委陈冰为组长的浙江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9月10日,浙江省委正式公布了“省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冰,副组长季维新、王起、沈策、孟克明、薛驹。

6月6日,杭州大学部分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大字报。于是,《浙江日报》社在三四天中贴出了六七百张矛头指向编委会的大字报,“揭发”于冠西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错误决定，撤销因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的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24日，《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并发表了题为《打倒抗拒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社论。至此同时，杭州大学掀起了所谓“林夏战役”，即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杭州大学前副校长林淡秋和著名宋词学家、教授夏承焘等人。其它大专院校师生也以大字报形式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下，省委宣传部错误地开始揭批部长金韬。

6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这次大会的召开以及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是力图保证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制止运动发生的混乱。

6月28日，浙江大学1361名师生联名起草了给毛泽东、党中央的电报，要求撤销在浙江大学的省委工作组。他们要求省委转送此电报，但省委没有转。

7月14日，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响应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的倡议，纷纷表示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一切封建阶级、资产

阶级的陈腐势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初，毛泽东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号召，迅速的传遍了全省各地区各个行业。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湖州等市的市委和市委工交政治部，分别召开了重工、轻工业局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他们纷纷表示“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自己行动纲领，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驻浙海、陆、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决心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8月5日，浙江省委决定并宣布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联络组。但在工作组、联络组撤离时却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揪住不放，说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镇压学生运动”、“打击革命知识分子”，批判工作组贯彻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8日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十六条）广播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和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广大工农兵，纷纷写大字报，举行座谈会，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自觉地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12日，省市1万5千多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敲锣打鼓到浙江省委机关送喜报、表决心，“响应毛主席的伟

大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赖可可，省委常委，副省长李维新，省委常委陈冰、沈震，副省长任一力接待了广大群众。

8月19日，省市10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庆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由省委常委、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永主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讲了话，浙江大学等14个单位的师生员工代表和工农兵、干部代表先后讲话。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

8月中旬，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迅速从北京流传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并公布于众。从此，浙江省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开展起来。8月23日，杭州市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刷标语、贴大字报，砸了一些商店和街道的招牌、路标，并将“延龄路”改名为“延安路”，“杭笕路”改名为“红卫兵路”，“都锦生丝织厂”改名为“东方红丝织厂”，“王星记扇厂”改为“东风扇厂”，“张小泉剪刀厂”改为“杭州剪刀厂”，“云翔女子服装店”改为“爱武女子服装店”等。宁波市农业职工中学的红卫兵涌上街头，向东福园菜馆提出立即“改革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臭招牌”。在红卫兵的要求下，东福园菜馆改名为“东方红菜馆”。23日下午，金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把市区大街上的“祝裕隆”、“九德堂”、“清和园”、“三友”等商店招牌，全都

砸烂，并更换了新名字。全省几个主要城市的基层商店，都以“工农兵”、“人民”、“大众”、“为民”、“东方红”等千篇一律的牌号代替原来的招牌，传统的商业招牌被取消，装饰品予以停售。24日，《浙江日报》发表《“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万岁！》的社论对全省的红卫兵上街，大破“四旧”予以支持和充分的肯定。此后，全省各地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名义下，批斗、游街、体罚、抄家等侵犯人权和破坏文化等行为遍及全省。

3月23日，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以张永生、杜英信为首的“红卫兵战斗队”。此后，各大专院校、机关、企业，纷纷成立战斗队。

3月26日开始，全省各地红卫兵破“四旧”之风转向冲击寺院，捣毁神像、古墓、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全省各地许多寺院、古墓、书画相继遭劫。杭州市的平湖秋月字碑、虎跑泉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秦桧塑像都遭到破坏。当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时，根据省委指示，浙江大学等单位组织了部分师生进行劝阻，并呼吁各界予以保护，得到广泛的支持。杭州钢铁厂组织部分工人分乘八辆卡车赶往灵隐寺，与浙江大学学生、当地农民守护在天王殿前，不让企图砸毁灵隐寺的人进去，一直守护到3月底，周恩来总理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使这座古刹得以幸存。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进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

地红卫兵。浙江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从此，全省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大串连”，红卫兵运动进一步走向社会，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

同日，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府大楼前，“炮轰”省委，以静坐相挟，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江华未予接见。他们即把此事称之为“8·31”事件。随后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策划下，立即把主要斗争目标对准“江、李、二陈”（即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等各级党政领导人，全省呈现大动乱局面。

9月1日，“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成立。3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成立。4日，“杭州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成立，并设立了红卫兵纠察队。随后，省内各地区纷纷分系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在全省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4日，杭州化工学校建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间金华地委”的大字报，点起了炮轰金华地委之火。7日，浙江师范学院学生又把“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贴到地委大院内。8日晚，由于金华地委机关的群众组织不同意大字报上的观点，便于浙江师范学院的部分师生在地委机关内发生了冲突，继而两派先后成立了地区性的“金一司”和“金二司”两个群众组织，并接连发生一系列流血事件。“金二司”组成

金华北上控告团赴京。10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在首都政协礼堂接见了“北上控告团”，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说什么“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镇压学生事件”。李学智（金华地委书记）“镇压群众”“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由此，金华地区乃至全省两派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省委举行大会，欢迎前来杭州进行串连的首都及全国各地的学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致欢迎词。12、13日，副省长刘剑、杭州市副市长周凤鸣代表省市府到杭州火车站欢送本省第一批统一组织、统一安排赴京串连的1万2千多红卫兵和师生。

9月15日，杭州成立了“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28日，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召开所谓“揭发、批判省委常委、文革组长陈冰”的万人大会。会上出现两种对立意见。由此机关干部出现分裂，一派被当作“保皇派”。从10月份开始，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理论指导下，各造反派组织向各级党委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冲击。10月4日至5日，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浙大体育馆召开“揭批陈伟达（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大校长）大会”。16日，浙江大学等一些“造反派大队”在省府大楼广场召开持续八天的所谓“强烈抗议扣压电报事件大会”。21日，省级机关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所谓“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

“倒陈冰”等口号。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对“炮打司令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出现了对立的“革”与“保”两派。少数机关干部从内部“冲杀”出来，外呼内应，向社会抛材料抛档案，为运动推波助澜。

10月10日凌晨2时34分，省军区某部三连战士蔡永祥，为保卫满载几千人的列车及钱塘江大桥，奋力排险，英勇献身。31日，省市各界6万多人隆重集会追悼欧阳海式的英勇蔡永祥。浙江省委作出决定，号召全省人民认真学习蔡永祥烈士的英勇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党委追认蔡永祥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学习蔡永祥。

11月初，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部分造反派开始批“西清”工作队，要求省委罢免工作队队长徐钊的职务，省委没有同意。杭丝联造反派头头俞森鹤等人借机鼓动大批工人在省府大校场静坐请愿。7日，又煽动二千余人冲上火车赴京“告状”。这种大规模的赴京“告状”事件在全国开了先例，造成生产停顿和交通阻塞。俞森鹤等在京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接见和支持，旋即在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也称“俞式造反兵团”。

11月6日至20日，浙江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造反派为了控制这次会议，经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同意，由省级各机关造反派抽人主持会务工作。会议期间，经常发出由省委个别人支持的一些

造反派抓揪与会干部事件，使会议不得不多次转移地点，但仍无济于事。20日，省市被迫决定“暂时结束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13日，省委一些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来自全省各地的50族个单位3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旧省委文革小组；炮打省委，火烧江华，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会上，李丰平被迫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宣读了“撤销省文革小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的决定。17日，大专院校部分红卫兵再次冲击省委机关，在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材料。此后，省级机关各单位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1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派林岗、李洪顺等人来浙江，在杭州设立“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对搞乱浙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12月1日至3日，“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杭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发起召开了来自全省各地一千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所谓“浙江省、杭州市革命群众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从此，全省各地掀起了一股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浪，“横扫”、“火烧”、“罢官”以及“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刮遍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遭到冲击，大批领导干部靠边、挨斗，党组织基本上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全省陷于动乱之中。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这个文作传达后，“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省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在林彪、江青一伙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煽动下，许多工人借口反对“以生产压革命”，擅自离开生产岗位，“杀向社会”，搞串连。随后在农村也出现了农民“造反”队伍。霎时间，社会上造反组织，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争吵不休，开始出现冲突，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不少工厂被迫停工停产，有些地区交通受阻，城乡物资交流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冲击。

12月23日，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所谓省委存放在省军区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人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闯入作战室，在全国开创了冲击军事机关的先例。24日，浙大造反派组织派人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状。27日，林彪向浙江省军区下达了所谓“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等三条指示，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12月30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杭州成立。

同日清晨3时，以“省联总”为首纠集了“省机总”、“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及北京、哈尔滨等外省市联络站、战斗队等22个造反派组织封闭《浙江日报》，夺了编委会的权。当天起《浙江日报》改出《新华电讯》版，由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主编，并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封掉〈浙江日报〉——告全省人民书》。指责《浙江日报》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改了政治方向，沦落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充当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得力的工具。“勒令”省委“彻底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1967年1月10日，“省联总”、“省机总”、

“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造反派组织正式宣布夺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社的大权。当天《浙江日报》复刊，“省联总”掌握了全省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同时，“省联总”等24个造反派组织支持《杭州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了《杭州日报》社。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经过几年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全省全年工农业总产值78.5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农业产值32.78亿元，增长2.8%；粮食亩产达到374斤，全省第一年粮食亩产超过“纲要”。一年中全省建成近60万亩的电力排灌工程，这些工程当年兴建当年受益，在实现农业丰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产值45.73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长6.2%，重工业增长35%。特别是在前8个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13.9%。但下半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

命”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下降。